

亚太论集（2012）

亚太地区的文化共同体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 编

执行主编 吴杰伟



中国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

书 名：亚太论集（2012） 亚太地区的文化共同体

编 者：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

执行主编：吴杰伟

出 版 者：中国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

China Century Press Group co. , Limited

China Social Science Documentation Press

香港鲗鱼涌太古城花山阁 26 楼 A 座

Flat / Rm. A, 26 / F. , Wah Shan Mansion, Taikoo Shing,

Quarry Bay, Hong Kong

电话/Tel: +852 2186 7919

传真/Fax: +852 2186 8413

E – mail: 909815163@ qq. com

开 本：16

印 张：12.25

字 数：235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988 - 16561 - 4 - 8

定 价：38.00 元

目 录

前言	1
从壬辰倭乱后朝鲜赴日通信使的成行看朝鲜士大夫阶层的华夷观	徐 凡 1
一、备边司和通文馆的意见	2
二、关于是否派遣通信使的群臣大讨论	3
三、在野文人的对派遣通信使的看法	5
丁酉再乱期间中韩围绕《海东诸国纪》展开的书籍外交	黃修志 7
一、申叔舟及其《海东诸国纪》	8
二、丁应泰以《海东诸国纪》弹劾朝鲜	11
三、朝鲜君臣之反应	15
四、李廷龟奏文对丁应泰的驳斥	18
五、朝鲜燕行使的外交斡旋与北京官员之反应	21
六、结语	25
清末民初“非组织化”同乡群体的日常生活——以旅沪常州人を中心	林 眇 29
一、来上海——异乡的故乡“重建”	31
二、同乡群体的日常活动	34
三、“非组织化”的旅沪客籍群体	37
从无待到有待：20世纪早期的“以农立国”论	梁 心 42
一、近代中国城乡对立的出现	43
二、章士钊的“农国论”	46
三、“以农立国”与“农不可以立国”	50
四、结语	53
近代方志转型研究综述	王 慧 55
一、指导思想	56
二、编纂方式	56

三、类目设置	58
四、方志形式	59
五、小结	60
蒙古国国史编纂及其20世纪国家发展之路	刘迪南 62
一、蒙古国国史编纂与国家发展之关系	62
二、20世纪20~30年代的蒙古国史编纂	63
三、20世纪40~80年代的蒙古国史编纂	65
四、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蒙古国史编纂	66
五、结语	67
文化的战略功能与东亚的区域文化认同：以中日韩三国为例	李冬新 69
一、引言	69
二、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	70
三、东亚文化的现代流变及其战略文化的特征：以中日韩三国为例	72
四、文化的战略功能及现代东亚文化的构建基础	77
五、东亚区域文化认同的构建路径	79
六、结论	80
文化工业中的艺术与时尚	马欣 82
一、艺术与时尚的特性	82
二、“文化工业”之我见	84
三、日渐趋同的艺术与时尚	87
法国汉学社会学家葛兰言在中国	吴银玲 89
一、葛兰言在北京的生活	90
二、葛兰言的“追随者”	93
三、葛兰言在民国学界的“反响”	97
日本法学博士与宪政传播	史洪智 101
一、庚子国变后中日两国人员往来	102
二、两国人员往来中的法学博士	104
三、佣聘日本法学博士与法典编纂	108
《文心雕龙》和《文镜秘府论》中“文”的观念辨析	兰善兴 113
一、“文心”与“文镜”	114
二、“真言”与“中道”	117

蒙古国国史编纂及其 20世纪国家发展之路^①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刘迪南

一、蒙古国国史编纂与国家发展之关系

20世纪对于蒙古国^②来说，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从1911年外蒙古自治，到1921年人民革命胜利，建立共和国，再至1990年的民主改革，一个世纪之内的三次大变革给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变革的跌宕起伏，整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也在不断转型之中。20世纪以来蒙古国编纂的国史著作如同风向标一样，时时刻刻受到国家命运和国家意志的影响，同时以历史话语传达着变革的林林总总。历史写作和编纂总是与国家命运的走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蒙古国的史学家和历史研究者敏感于国家历史、文化的转型，不断以新内容、新材料、新方法、新视角充实着历史写作，推进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的发展。这就构成了一种“复线的历史”：一方面，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记录了蒙古国新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历史叙述和历史话语在表述过去的过程中，根据当下的需要来收集摄取业已扩散的历史，从历史中寻找有利于己的内容，也正因为如此，新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话语一旦形成，又会对现实形成制约，从而揭示出现实与历史的互动关系。”^③细读并比较不同时期蒙古国官方出版的国史著作，会发现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关系留在历史写作和编纂中的痕迹非常明显。

在新材料、新方法、新视角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修正以往的历史编纂和写作，服务于现实，服务于国家，始终是各个时期蒙古历史研究者和写作者的重要任务。20世纪以来，蒙古国官方组织编写和出版了一系列国史著作，如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A.阿穆尔（А. Амар）的《蒙古简史》^④、L.登德布（Л. Дэндэв）的《蒙古简史》^⑤，D.那楚克道尔

① 该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1&ZD082

②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后，建立独立国家。1924年改国名为蒙古人民共和国。1990年民主改革之后，改称蒙古国。

③ [美]杜赞奇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④ А. Амар: Монголын төвч түүх, 1934 он.

⑤ Л. Дэндэв: Монголын төвч түүх, 1934 он.

基（Д. Нацагдорж）的《蒙古史纲》^①；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一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②，60年代中叶出版的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③，80年代出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④修订本，90年代中叶出版的《20世纪蒙古史纲》，以及21世纪初出版的五卷本《蒙古国史》^⑤等。上述著作从编写和出版时间上看，蒙古国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每隔10~20年就会有新的国史出版。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史著作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些国史著作之间，既存在着连续性，又各具特点。把蒙古国各个时期出版的国史著作当做透视蒙古国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的窗口，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和一种话语进行研究和解读，揭示出20世纪以来蒙古国国家发展和转型的现实与历史话语表述之间的互动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根据1921年之后蒙古国官方出版的国史著作的特点以及蒙古国史学史发展情况，本文将蒙古国历史编纂和写作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

- 第一阶段 20世纪20~30年代
- 第二阶段 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
- 第三阶段 20世纪90年代之后

二、20世纪20~30年代的蒙古国史编纂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以博格多格根为国家元首的蒙古国。1924年博格多格根逝世，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建立共和政体，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了，从此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新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将沿着怎样的道路发展是摆在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是效法苏联，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学习日本、英国等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三是继承民族传统，走民族民主主义路线。面对这三种选择，执政党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最终执政党中主张效法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左派获得了胜利，蒙古人民共和国选择了通过走非资本主义道路逐渐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一批持民族民主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被指为“右派”和“民族主义者”。左派得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强有力的支持，在蒙古的党和政府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并开始全面效法苏联。激进的极左政策在蒙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迅速激化，20年代末爆发了从蒙古西部省份开始，最后几乎波及全国的大规模起义，整个国家陷入了困境。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同时也暂时浇灭了极左政策的熊熊烈火。30年代初，蒙古开始实行旨在修正极左错误的“新政策”。尽管“新政策”的实施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却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20年间思想多元、自由

^① Д. Нацагдорж: Монголын түүхийн товч, 1936 он.

^② Бүгд Найрамдах Монгол Ард Улсын түүх, Москва, 1954 он.

^③ Бүгд Найрамдах Монгол Ард Улсын түүх, 3 боть, 1966, 1968, 1969 он.

^④ Бүгд Найрамдах Монгол Ард Улсын түүх, 1 боть, 1984 он.

^⑤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түүх, 5 боть, 2003 он.

活跃的时期。20世纪20~30年代蒙古国史编纂和写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这一时期官方出版的国史著作主要有A.阿穆尔的《蒙古简史》和D.那楚克道尔基的《蒙古史纲》。这两部史著有很多共同之处，体现了20世纪20~30年代蒙古国历史编纂和写作的主要特点。首先，从两部史著的作者看，阿穆尔和那楚克道尔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史学训练。但他们都是享誉蒙古的知识分子，兼具政治家、作家、学者的身份。这样的身份特点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蒙古历史写作群体中颇具代表性。其次，从两部史著本身而言，都摆脱了佛教史学的窠臼，继承了蒙古原有的历史编纂和写作传统，同时尝试性地利用当时最新的考古成果，体现了20~30年代蒙古国历史编纂和写作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新特点。再次，两部史著都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通过书写本国、本民族的历史启发和教育国民，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正如阿穆尔在《蒙古简史》的序言中谈到的，“人民只有熟知民族国家的历史才会有爱护民族、国家的意识。历史尽管是过去的事，但是比照从古至今的国家兴亡、民生起落、政治得失，以史为鉴，扬长避短，正如古人所言‘其善者吾师，不善者亦为吾师。’”^①

A. 阿穆尔的《蒙古简史》

阿穆尔的《蒙古简史》是为庆祝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十周年，由政府授意而作。该《简史》分10章，一半的篇幅记述了从蒙古人起源到成吉思汗之前的蒙古高原各游牧政权的历史。另一半篇幅则重点记述成吉思汗时代的历史。《简史》将蒙古人的起源追溯到匈奴时代，明确地提出了蒙古历史并非从成吉思汗时代才开始，而是从匈奴时代即开始。该观点的提出，将蒙古的历史向前追溯了一千多年，同时也试图证明蒙古民族自古即是独立的民族，并在历史上不断建立政权。这一观点奠定了蒙古国史学界关于蒙古历史起于匈奴时代的基础。《简史》的记述重点在成吉思汗时代。这是蒙古民族历史上最煊赫、最辉煌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蒙古历史具有了世界史的意义。作者将写作重点放在这一时期具有深远意义。时值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十周年之际，蒙古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作者希望通过成吉思汗时代大蒙古国的辉煌历史告诉人民，蒙古的历史并非只有短短十年，而是悠久和灿烂的。同时，新的国家刚刚建立，这个国家将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向前发展，整个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些都是摆在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阿穆尔以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和感知力，将民族主义的思想灌输到历史写作当中，通过历史的表述回答了上述问题——蒙古民族渊源有自，完全可以从成吉思汗时代的历史中汲取力量，继承本民族的传统，为国家的发展而奋斗。蒙古国著名历史学家A.奥齐尔（A. Очир）也谈到，“他（阿穆尔——引者注）的作品记述了蒙古人最强大、最自豪的成吉思汗时代，这必将激起蒙古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②

从《简史》所参考和使用的史料文献看，利用了蒙古文史料外，还利用了中文、西文史料以及考古发掘的碑铭石刻等材料，体现出蒙古历史写作开始由从传统向现代转变。

^① [蒙] A. 阿穆尔：《蒙古简史》（蒙古文），序言，乌兰巴托，2006年，第21页。

^② А. Очир： Монголын төвч түүхийн өмнөх үт, 1989 он.

D. 纳楚克道尔基的《蒙古史纲》

1936 年时任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室负责人的 D. 纳楚克道尔基撰写了《蒙古史纲》。作者以成吉思汗的生年 1162 年作为该《史纲》的纪元元年，以编年体记述了从成吉思汗前 3858 年（公元前 1696 年）的黄帝时期到成吉思汗 774 年（公元 1935 年）的历史。作者在开篇即明确交代了该《史纲》的写作目的——“供广大人民群众了解自己的历史，从而建设我们的国家，使国家繁荣昌盛。”^① 这与阿穆尔的《蒙古简史》写作目的基本相同，反映出“新政策”时期历史写作中民族民主主义思想的复兴。尽管《史纲》篇幅不长，却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第一部系统记述蒙古史的著作，在蒙古国历史编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新政策”并未持续多久，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清党运动，大批持民族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次运动中遭到迫害，其中包括上述的阿穆尔和那楚克道尔基。与此同时在蒙古历史编纂和写作方面方兴未艾的民族民主主义思想受到压制，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史观和方法论，蒙古历史编纂和写作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开始逐渐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时期。

三、20 世纪 40 ~ 80 年代的蒙古国史编纂

20 世纪 20 ~ 30 年代，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蒙古人民革命党中主张蒙古通过走非资本主义道路逐渐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左派”获得了胜利，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苏联，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浪潮。30 年代中后期，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论著被译成蒙古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论开始成为包括蒙古历史编纂和写作在内的蒙古国思想和科学领域研究的指导思想。1946 年，成立不久的蒙古国立大学聘请苏联专家卡梅什科夫（Б. Н. Камешков）负责历史教学。1947 年蒙古国立大学创立了蒙古高等教育中的第一个历史专业，并于同年招收了 15 名学生。这些学生是蒙古第一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培养出来的专业历史人才。1949 年他们从该专业毕业，成为新时期蒙古国历史教学、研究和历史编纂的基本力量。50 年代，从该专业毕业的专门历史人才中涌现出了如 Sh. 纳楚克道尔基（Ш. Нацагдорж）、S. 普日布扎布（С. Пүрэвжава）、M. 桑嘉道尔吉（М. Санждорж）等著名历史学家^②，他们顺应当时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国家的需要，日后成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历史编纂领域的中坚力量。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之际，1954 年，苏联科学院和蒙古国科学院的历史学家们共同撰写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在莫斯科出版，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

^① [蒙] D. 那楚克道尔基：《蒙古史纲》（蒙古文），《D. 那楚克道尔基全集》，2008 年，第 167 页。

^② 参见《20 世纪蒙古国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蒙古文），蒙古国立大学历史研究所，2010 年，第 75 页。

一部由官方组织编写和出版的通史著作，同时也是第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蒙古人民的历史。”^①该《通史》分上、下两部。上部按照“原始公社制度”、“部落联盟和最初的国家在中亚及东亚的形成”、“蒙古早期封建国家”、“14~17世纪时期的蒙古”、“在清朝征服者统治下的蒙古（1691~1911）”、“外蒙古自治时期”的分期记述了从远古到蒙古人民革命之前的历史。下部记述了蒙古人民革命至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蒙古国现代史的分期，即1924~1940年，蒙古人民为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而斗争的时期；1940~195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受编纂时间的制约，该《通史》中的现代史部分涉及的时间段比较短，分期主要是以国家制度的选择和发展为历史分期的标准。作为首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论记述和分析的通史著作，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出于为国家意志服务的需要而歪曲历史事实、根据结论选择史料等问题，这些都遭到后世研究者的批评。但该《通史》奠定了20世纪40~80年代蒙古国历史编纂的基础，成为蒙古国现代历史编纂的滥觞。

第一部通史著作出版之后的十年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都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面对新的发展阶段，1954年出版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已经不能全面、及时地反映国家的发展以及历史研究、写作和编纂的新成果。于是50年代末，蒙古科学院开始计划联合苏联和中国的学者合作编写多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然而受到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中国的学者最终没有参与多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的编写工作。苏联学者虽未直接参与《通史》的写作，但对《通史》的写作和编纂给予了指导。

1966~1969年，由蒙古国历史学家独立编写的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正式出版。1966年出版的《通史》第一卷记录了从远古到17世纪蒙古人的历史；1968年出版了《通史》第二卷，记录1604~1917年间的蒙古历史；1969年出版的《通史》第三卷记述了1921年至1966年间蒙古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历史，即所谓的新时期蒙古史。该《通史》基本框架仍延续1954年《通史》的结构，但从内容、观点、材料等各个方面与1954年《通史》相比都有了提升。方法上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内容上更加翔实，许多历史事件的细节得以展开。观点上吸收了当时各个时期蒙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②三卷本《通史》的意义不仅在于推进了蒙古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这是第一部由蒙古学者独立完成的国史，反映出当时蒙古史学家对本国历史的最新观点和研究水平。经过近三十年的积累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论在蒙古历史编纂领域的主导地位得以完全确立。

四、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蒙古国史编纂

受苏东剧变的影响，1990年蒙古国进行了民主改革。经过改革，蒙古放弃了社会主义，选择了民主化的道路。国家的变革再次深刻地影响着历史编纂。蒙古国的历史学家们

^①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中译本，译后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529页。

^②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蒙古文），第一卷，1966年，第7页。

逐渐开始摆脱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回溯和反思过去近 70 年间，蒙古历史编纂和写作当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尝试用新的方法写作和编纂本国历史。蒙古国历史编纂开始进入多元、自由发展的时期。

1995 年，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了《20 世纪蒙古史纲》^①。该著作被称为是“澄清饱尝过去一个世纪损失的民族历史的首次尝试。”^② 该书在体例上，一改按照编年体撰写蒙古历史的方法，将 20 世纪蒙古国的历史按照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专题分别撰写。政治史部分主要记述了 20 世纪蒙古国经历的三次变革，即 1911 年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1921 年人民革命和 1990 年民主改革。经济史部分记述社会经济的三种关系，分别是 20 世纪初的社会经济状况，人民政权时期的社会经济革新、进步和失误，以及社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最后是文化史。值得注意的是，民族民主主义思想在尘封了 70 余年之后得以复苏而再次成为历史编纂的指导思想。

蒙古国民主改革的第十个年头，1999 年时任蒙古国总统的巴嘎班迪下达总统令，要求重新编写蒙古国史。“今天，蒙古国的经济、政治、精神生活都转移到新的关系中，民族意识复兴，学习和研究本民族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学习治国之道的需求与日俱增，发展史学研究的要求也不断增加。三卷本蒙古国史出版后已经过去近四十年，这期间我们的学者们在许多历史问题上取得了新材料，获得了新观点，完成了新的论著。在人类即将走入新千年之际，撰写长达几千年的蒙古历史，尤其是考虑到青年一代树立历史意识这一社会要求，支持蒙古国科学院的提议，下达（重新编写蒙古国史——引者注）总统令。”^③ 蒙古国历史研究本身的发展、国家改革和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都提出了重新编纂蒙古国史的要求。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2003 年五卷本《蒙古国史》^④ 应运而生。该《国史》记述了从蒙古高原的原始先民到 21 世纪初蒙古国的历史。该史著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蒙古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汇集了蒙古国各个阶段历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尤其是关于 20 世纪蒙古国历史，提出了很多与 1954 年国史和 20 世纪 60 年代三卷本国史迥异的新观点。2003 年出版的五卷本《蒙古国史》体现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蒙古国历史学界对过去历史编纂和写作的反思，并将蒙古国的历史编纂和写作带入了自由多元的新世纪。

五、结语

20 世纪，蒙古国经历了多次变革，国家发展之路曲折前行。这既是蒙古国史编纂的具体语境，同时也是蒙古国历史写作的主要内容。国史的编纂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

^① Хорьдугаар зууны түүхийн тойм,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Академийн Түүхийн Хүрээлэн,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95 он.

^②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хөгжлийн бодлого, үзэл баримтлал: хувьсал, өөрчлөлт,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Шинжлэх Ухааны Академийн түүхийн хүрээлэн,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8 он.

^③ 1999 年 1 月 19 日第八号蒙古国总统令——“关于重新编写蒙古国史”。见《蒙古国史》，乌兰巴托，2003 年。

^④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түүх, таван боть,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Академийн Түүхийн Хүрээлэн, Улаанбаатар, 2003 он.

事”。一方面，蒙古国国史的写作和编纂具有推进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国史的多次重写适应了国家、社会现实不断变化的新需求，是推进民族意识复兴、保障国家安全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因素，对于研究蒙古国的历史和现状都非常重要。本文尝试性地探讨了蒙古国历史编纂与国家发展之路盘根错节的关系及其具体演进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扩展和细化。